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18 年第 1 期· 总第 697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德国问题研究所·《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政治动态

- 德国外交部长的重要性回归
- 联邦卡特尔局考虑惩罚脸书

经济纵横

- 汽车供应商考虑新商业模式
- 电网应急措施开支创纪录
- 德国人热爱现金

社会万象

- 除夕推特之争：警方对选择党人提出犯罪指控

热点透析

- 西方的危机：2017——威权政治强势来袭
- 新年新改变——做有态度的德国人

德国外交部长的重要性回归

《南德意志报》网站1月2日讯 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参观了在马扎里沙里夫阵亡的士兵纪念碑。56名士兵在兴都库什执行任务时丧生，每位死者在墙上都有对应的白色牌子。在加布里尔阿富汗北部之行时，军队牧师问了他一些问题：“政治能对什么负责？政治必须要敢于做什么？”他回答：“如果没有担当意识，没有人能够进入政治领域。”

要有担当，要有胆识，但是说这话时他还不需要做到这点，他目前只是暂时代理外交部长一职。他原本只需要做最紧急的事情，低调一些、管理好自己的部门。但是他的行为就像把外交部当成世界上最重要的部门，这也可能是为了给自己做广告。不过他也向大家展示了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尽管外交官们自己对此都没那么有信心。

当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进行“牙买加联盟”试探性谈判的时候，没有人想争取外交部长这个职位——它太不重要了。恰巧此时外交部也陷入了自我怀疑中。此前它被认为是除了总理之外最重要的部门，外交部长等于副总理，定期在每日新闻上露面。但是在“牙买加联盟”试探性谈判时一切突然变了：自民党宁愿要数字部，并声明财政部是关键部门。绿党内部相互争执。甚至立马能成为最受欢迎的部长——这样的光明前景历任外交部长一般都经历过——也无法激起人们对外交部的兴趣。对联盟党来说，谁愿意做外长似乎都不成其为问题，反正主要是默克尔在总理这个位置上制定外交政策。

如果谁在这个时候和外交部领导层谈话，都能感觉到他们的沮丧和失望，他们觉得被“冷落”了。当柏林“牙买加联盟”还有希望的时候，加布里尔在孟加拉国看望罗兴亚难民，他还去了华盛顿。此后他在柏林外交论坛的主题演讲中重新界定了跨大西洋关系，要求德国和欧洲以更自信的面貌在世界亮相。这是对外发出的信号，对内则是：看，这儿要有大动作了。外交部员工后来说，他们被要求认真听加布里尔的发言。

给外交部带来最深伤害的是绿党，这并不是在本次谈判中才出现的。外交部在绿党历史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使绿党发展成今天的样子。1998年绿党与社民党共同组阁，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绿党）任外交部长，这最清楚的表明，绿党来到了政治中心。菲舍尔的个人和外交部长这个职务合为一体：每次他都用“外面是部长，里面是绿党”这样的口号为自己做宣传。

绿党成为反对党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外交部是精彩历史的战利品，好看但是对此时此地价值不大。2011年绿党议会党团时任主席于尔根·特里廷（Jürgen Trittin）对外交部评价不高，说它“已经大大失去了影响力”，他更想青睐财政部，柏林当时忙于应对欧债危机，钱很重要。2017年绿党在“牙买加联盟”谈判时，尽管绿党主席策姆·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对外交部表现出兴趣，但是在党内有更坚定的声音认为，这仅仅对厄兹德米尔自身的政治生涯有利，但却有损绿党。结果，厄兹德米尔突然转向争取经济部长的职务。

自民党把自己的历史和外交部联系在一起：前任党主席基多·韦斯特韦勒（Guido Westerwelle）喜欢联系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的成功史。2009年自民党与联盟党组成黑黄政府联合执政，韦斯特韦勒任外交部长兼副总理。他为人精明能干，作为外交部长却显畏缩，没能充分利用外长的优势为本党增光。与默克尔联合执政时，自民党垮掉了，2013年甚至没能进入联邦议院。自此对于自民党来说外长这个位置失去了吸引力。在“牙买加联盟”组阁谈判中，自民党甚至花更多的时间去琢磨，为什么其他党都不大可能拥有财政部长的这个位置。

现在社民党参与组阁试探性谈判，情况又不一样了，它在外交部花费了很多心血，它的成功史也和外交部有关。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如果没有当外交部长的经历（任期分别为 2005-2009 和 2013-2017），不可能成为总统。他为人严肃认真，自带外长一职需要的素质，同时这一职位也让他赢得了名气和声誉，使他最终能够当选总统。

其实此前早已有迹象显现外交部长这个位置面临着失去影响力的威胁。施泰因迈尔经历了随着默克尔有越来越多的执政经验，其在外交上的应对也越来越自信的过程。现在几乎每个联邦部必须有自己的国际事务部门才能应付得过来。施泰因迈尔利用自己外交部长的第二个任期，对这个位置进行现代化革新。他将“S 部门”（该部门负责危机预防、稳定、冲突后续处理和人道主义援助）员工增加至 180 人，拥有 20 亿欧元预算，以便能更快更高效地应对危机。部门负责人科尼希（Rüdiger König，60 岁）经历了施泰因迈尔的改革，他说：“如此这般坚定而又有强度的改革还是第一次。”

现在外长加布里尔因此受益，在看望罗兴亚难民的时候，他承诺要再给两千万欧元的紧急援助。加布里尔利用这个位置带来的好处，来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此前，社民党曾经对他作为党主席和总理候选人带领社民党参加竞选表示怀疑，因为他太不受欢迎，太变化无常。任外交部长一年后，根据民意调查，加布里尔竟然成为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成功实现了影响力的回归。但是他将不会出席 1 月 7 日开始的社民党和联盟党组阁谈判。党主席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也想这样。在担任党主席之前，舒尔茨作为欧洲政治家赢得了尊重和声誉。现在社民党内同时有两个领导人物认识到外交部长职位的重要性和蕴含的机会。

联邦卡特尔局考虑惩罚脸书

明镜在线 1 月 2 日讯 根据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的调查，脸书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搜集其数据。如果脸书不停止用户没有反对可能性的数据收集，那么卡特尔局将准备对该公司采取可行的惩处措施。卡特尔局主席蒙德特（Andreas Mundt）说：“我们谴责脸书收集和使用用户数据的方式，这是对市场权力的滥用。”蒙德特表示，现在要看脸书的回应，然后决定如何处理这件事。要么脸书自己给出一个解决方案，要么联邦卡特尔局必须禁止脸书目前的行为。卡特尔局表示，根据所谓的效果原则，卡特尔局有能力对脸书的做法采取措施，而不是对脸书的所作所为坐视不管。“只要在德国国内产生影响，我们就可以有效应对。”

2017 年 12 月中旬的时候卡特尔局就曾指责过脸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站在德国“以毫无限制地方式通过第三方渠道收集用户信息”。第三方渠道包括社交媒体 WhatsApp、视频平台 Instagram 以及访问脸书界面的其他网站。卡特尔局工作人员估计，脸书在德国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对此脸书予以否认。

经济纵横

汽车供应商考虑新商业模式

《德国商报》网站 2017 年 12 月 30 日讯 电动车、共享车、自动驾驶——汽车行业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变革。这也动摇了很多供应商的商业模式。一项研究指出了可能的后果。该研究结果显示，汽车工业的改变会迫使很多供应商彻底重新思考他们的商业模式。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和拉扎德咨询公司（Lazard）的汽车专家预料，电动车、自动驾驶和共享车等发展趋势在未来也会促使供应商更多地致力于软件而非硬件的发展。这两家公司据称为

了这项名为“2018 全球汽车供应商研究”分析了大约全球 650 家企业。

他们认为，到 2025 年，在欧洲，电动汽车将会占到新上牌汽车数量的大约三分之一，而在中国，这个比例甚至会达到近二分之一。替代传统用车方式的新理念，例如共享汽车，将会占汽车总销售量的 10%到 15%。未来 15 到 20 年内自动驾驶将会取得显著进展。对于供应商而言，这意味着增长放缓，技术进步加快，软件成为决定差距的因素，对标准化组件供应商也会造成更大的压力。

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菲利克斯·莫格（Felix Mogge）强调，这一变化会迫使供应商同时投资新旧技术。对于大多数的供应商来说，这是前途未卜的巨大资金投入。因为与此同时，许多产品的利润率正在下降。“不过正在向前发展的数字化也提供了新的机会。企业现在不得不考虑，如何配比新旧技术的发展力度才能保证他们的继续发展，他们应当与谁合作，以及他们可能必须要从哪些汽车工业部门完全退出。”

咨询公司德勤的“供应商行业展望 2025”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家公司的汽车行业专家们计算了供应商行业的几种情景：从维持当前的角色到与 IT 公司结盟，后者是汽车制造商的重要竞争对手。

然而，对这一切有一点都同样适用：从长远来看，与内燃机和传统变速器相关的内容将失去重要性。“2018 全球汽车供应商研究”表明，某些业务领域例如使用传感器的业务，特别是电池技术业务将显著增加。因此可以设想到战略是：先巩固现有市场，然后再进行扎实的融资和转型的实现。

电网应急措施开支创纪录

《法兰克福汇报》网站 1 月 1 日讯 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的扩建让德国电网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滕特（Tennet）是德国一家电网覆盖区域从石荷州延伸至巴伐利亚州南部的大型电网运营商。本周一，该公司表示，就目前的数据来看，因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扩建，该公司去年为应对电网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已投入约 10 亿欧元的资金。

2015 年时，这项应急措施的花费还仅为 7.1 亿欧元，在风力较弱的 2016 年甚至只有 6.6 亿欧元。此花费会以输电网费的形式转移到电价上，并最终由消费者来买单。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大力扩建使电网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因而我们急需能够服务于能源转型的电网，相应的电网扩建计划已获立法者批准通过。”滕特公司领导层成员哈特曼（Lex Hartmann）称。“但在新的电网建成之前，我们还得继续面对电网负载能力不足、电价高昂、供电更不稳定等严酷现实。”

德国联邦网络局局长霍曼（Jochen Homann）也注意到了这数十亿欧元的开支最后会落到消费者头上的情况。“维持电网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复杂，这让各方都投入了不少资金。只有修建承载能力更强的线路才能最终降低成本。”霍曼说。但他同时认为，在新的电网投入运营之前是可以确保电力供应的。“警告人们说在此之前会出现电力短缺的情况就有点夸张了。”

在由北向南风电传输线路不完善的情况下，采取应急措施是有必要的。秋冬两季风能充足，北部的天然气和燃煤发电站常常需要停工，或者给发放风力发电厂补贴让其停运。否则，北部所生产的电能就会超出电网的负载范围。而为了防止南部由此出现的断电情况，当地传统储备发电厂就必须全速运转。奥地利的储备电网常常也会被用于协调电力供应。对此，电网运营商也必须支付赔偿费用。

海上和陆地风电的扩建正进一步显著地向前推进。按照德国能源与水经济协会（BDEW）目前的数据，2017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比重从 2016 年的 29%上升到了 2017 年的 33.1%。

“只有扩建服务于能源转型的电网，才能缓和目前的局势”，哈特曼说。滕特公司和另一家电网运营商 TransnetBW 公司一起在为德国打造“能源转型的动脉”，这一名为 Südlink 的高压直流输电走廊计划将风电从北海输送到巴伐利亚州和巴符州。按照现今的规划情况，若无投诉延误工期，该输电走廊将于 2025 年完工。霍曼对工程的时间安排加以强调：“能在 2025 年实现新的南北输电线路的联通将一直是我们的目标。”

对于更多的电网扩建，哈特曼持乐观态度。“在 2018 年，我们就能看到实实在在的进步。在重大工程的建设上我们会取得可喜成效”，哈特曼称。电网运营商滕特公司因其电网扩建而在应急措施的开支上位列全德第一。德国联邦网络局称，到 2022 年最后一座核电站关停，全德每年的应急措施开支甚至可能会上涨到 40 亿欧元。

德国人热爱现金

《德国商报》网站 1 月 2 日讯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德国消费者早就不需要现金了，但是他们仍然很热衷钞票和硬币。与之相反的是，在其他地方无现金的世界几乎已经成为了现实。德国其实也可以这样。

在超市用智能手机结账、在咖啡馆用软件买卡布奇诺以及早已不使用现金的餐厅——许多德国人以为要在未来才能实现的或者他们强烈抗拒的场景，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了现实。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或新兴国家，非现金支付正在迅速增长。咨询公司 BCG 预计，大约到 2022 年，在印度，电子支付将会取代现金支付。而德意志银行的老板约翰·克莱恩（John Cryan）作出了现金支付存在时限的判断：在十年之内它将会消失，因为它“非常昂贵和低效”。但是德国人热爱现金。前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基民盟）把现金设定上限用于反犯罪，他这一举动掀起巨大波浪。尽管一再辟谣，还是有些人害怕现金马上就被取消。

没有什么国家像德国一样如此喜欢用硬币和纸币支付。根据巴尔科（Barkow）咨询公司的数据，在德国，只有大约二十分之一的消费是用信用卡支付的。该公司创始人彼得·巴尔科（Peter Barkow）表示，平均每个德国公民家中都存放有 2200 欧元现金。害怕被盗的心理显然对此几乎没有影响。而欧洲央行的一项研究显示，2016 年德国人平均随身携带 103 欧元现金，在欧元区这项数值的平均数仅为 65 欧元。

由于对现金的热爱，德国在非现金支付的方面落后了。BCG 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在 2010 年至 2016 年间，德国人均交易的非现金支付仅增长了 7%。这意味着即使在“现金忠粉”队伍中，德国的非现金支付也落后于葡萄牙（9.8%）和奥地利（8.2%）。只有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的非现金支付增长率比德国更低。BCG 专家霍尔格·撒克逊（Holger Sachse）表示：“在德国，在餐馆消费和购买食品的现金支出比例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很多消费者对新的支付方式心存顾虑。只有四分之一的消费者认为非现金支付是安全的。”

在美国、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即使是在小额消费中，使用信用卡支付也是很常见的。人们的口袋里装的不是装着现金的钱包，而是瘪瘪的卡片夹，里面只有驾照和银行卡。在瑞典，2015 年只有五分之一的商店消费是用现金结算的。瑞典央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你最近一次消费是用什么支付的”，有 70% 的回答是“卡片”（储蓄卡和信用卡），而仅有 15% 的回答是“现金”。有些餐厅已经不再接收现金支付了——而与此相反的是，在柏林，很多咖啡厅和酒吧都声明只接受现金。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汉堡店“Flippin’ Burger”的餐牌上写明了这是一家只使用无现金支付的餐厅，这对餐厅的顾客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只是有些时候游客会感到惊讶。孩子们的存钱罐都不再用得着了，因为即使是最小额的零花钱都被汇入他们的账户。甚至是在跳蚤市场上，很多瑞典人也是在用无现金方式支付。根据德勤公司的一项最新调查，大约三分之一的丹麦人和大约四分之一的瑞典人在商店消费时甚至是使用手机支付。智能手机软件也会被

用作于给朋友、熟人转账或者支付 Ebay 上的订单。

德勤的技术专家弗雷德里克·本克 (Frederik Behnk) 说, 丹麦人在非现金支付社会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 在这个过程中丹麦银行的手机支付软件起了很大的作用。丹麦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先一批实现完全无现金支付的国家之一。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 在德国也几乎没有人还需要现金。在一些超市里, 消费者可以做到通过信用卡支付小额账单, 不需要输入密码也不需要签名。年轻的金融公司与银行的合作, 可以实现让消费者不需要输入密码就能在网上给朋友转账。

非现金支付在德国仍未能广泛推行的原因不只是在消费者身上。很多餐馆和业务都只接受现金支付, 而且在交易过程中经常没有配备非现金支付所需要的计算机终端的。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 德国的一个自动取款机上有 13 个非现金支付的终端, 而在瑞典是 91 个。

Paydirekt 一份令人清醒的年度总结显示, 德国人仍然对新的付款方式持怀疑态度。在支付服务方面, 德国银行原本希望在迅速发展的网上交易方面跟美国公司 Paypal 进行竞争。用户可以直接从账户里为上网购物结账, 而不需要向第三方提供信息。但 Paydirekt 的进展缓慢: 推出这项服务两年后, 客户数为 160 万, 而 Paypal 则拥有 1900 万客户。Paydirekt 的客户也只占德国主要网上零售商的 20%。

巴尔科的咨询师表示, Paydirekt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市场早已被分配, 而银行已落其后。这些银行低估了 Paypal 的迅速发展, 于是现在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来跟上。不久之后, 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可能会进入市场。据未经证实的报道, 苹果公司打算在德国推行自己的支付服务。这将使智能手机具备电子钱包的功能, 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在商店交易、付出租车费和网上交易中用自己的银行储蓄付账。这可能成为改变现金国家德国的一个触发器。

社会万象

除夕推特之争：警方对选择党人提出犯罪指控

明镜在线 1 月 1 日讯 科隆警方对德国选择党人贝娅特丽克丝·冯·施托希 (Beatrix von Storch) 提出煽动罪嫌疑的指控。科隆警方在除夕夜用多种语言在“和平庆祝, 示以尊重”的口号下给科隆的人们传达新年祝福, 其中包括英语和法语。联邦议会议员施托希也发了一篇阿拉伯语的推文作为回应。她公开表示了她的愤怒, 在推文中写道: “真不明白这个国家是怎么了? 北威州警方为何会在官方网页发布一条阿拉伯语的推特。难道你们认为这样可以安抚那群野蛮的、穆斯林轮奸犯么?” 随后推特以其违背禁止发布仇恨类信息的规定为理由, 暂时封闭了施托希的推特账号。施托希周一发出的推文无法再浏览。尽管施托希之后在脸书上发布了推文的截图, 但随后就被删除了。同时, 德国选择党议会党团主席艾利斯·威德尔 (Alice Weidel) 周一在脸书上写道: 这一年以审查法和官方对这群外来的、四处抢劫、掠夺、持刀执棍的移民佬们的屈从为开端, 最危险的是我们已对这群乌合之众的存在习以为常。尽管德国的官方语言是德语, 但我们的警方仍以阿拉伯语交流。

科隆警方的新闻发言人托马斯·海尔德 (Thomas Held) 表示: “这是一次完全平常的行动, 并无任何特殊之处。若存在犯罪的嫌疑, 我们必会查清真相, 依法处理。” 他还说, 警方用多种语言向人们传达祝福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我们的目的是向人们传达祝福”。因此, 在诸如游行或是狂欢节等大型活动期间, 警方也会用其他语言向人们传达祝福。“对此, 一些人会感到惊讶, 但于我们而言, 这是一种正常传递信息的方式。

西方的危机：2017——威权政治强势来袭

《南德意志报》网站 2017 年 12 月 30 日评论 威权有不同面孔：埃尔多安、高兰德、普京、斯特拉赫、特朗普、卡钦斯基。对于威权的壮大有多种解释，比如社会不平等或者移民问题。但这些解释还不充分。文化斗争才刚刚开启。

争议早就有了。所以这里首先摆出 2017 年几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德国选择党进入联邦议院，在第二票上获得 12.6% 支持率；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在奥地利，有 1316442 人投票给了奥地利自由党，其获得的总票数占有效票数的 25.97%；波兰民粹主义政府一步步控制了司法；俄罗斯、土耳其、印度或者匈牙利的威权领导人物和煽动者给社会带来剧变。社会公平或社会秩序产生自不断变化的话语。现在正发生很多变化。西方自由的社会身陷威权压力。“愤怒时代”到来，威权的领袖人物们利用多数愤怒之人的犬儒态度和不满，谈论的都是“威权的起义”“人民的反抗”和“欧洲黄昏”。

对威权力量增强的解释不胜枚举。譬如：

难民和移民政策

无论是右派保守力量自身还是它的反对者们，在解释右派保守力量增强时，大都首先将原因归结于难民和移民政策。这一现象并非只出现在德国。在论述中，那些求助者，尤其是自 2015 年夏来到德国的求助者，通常都被作为一个投射面。个人、个体的命运并不重要，因此也就从公共讨论中消失了。剩下的便是彻头彻尾的外来人，他们“和我们”格格不入并且还时不时的成为右派民粹者的动员帮手。

不平等

政治左派通常会将不平等作为右派政党和威权蛊惑者当选的理由。这也就是说，谁经济上失利，工作中遭遇不平等对待，将贫富之间、上层与下层人士间不平等视为耻辱，那么他迟早会在投票站发泄自己的不满。

事实上，德国人之间的经济条件的确差异巨大。德国人中，较为贫困人口占 50%，但他们仅掌握所有私人家庭净收入的 2.5%。社会阶层和职位跃层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相比于 1960 年，如今出生在贫困家庭的人通常更容易保持贫困的状态。这些情况都不利于社会团结。但这并不符合事实，例如，所有选民中支持选择党的选民在经济上并不差。

自由主义没有实现承诺

人们不满于不平等加剧，进而直接导致对消除不平等的可能性消失的不满。而这也演变为自由主义的危机。文学学者阿尔布雷希特·科索奇（Albrecht Koschorke）认为，2017 年的自由主义无法再向所有人许诺未来，无法为所有人带来如同工业现代化曾经能够可信地保证进步。当自由主义无法再保证未来所有人的文化和经济参与，那么它将陷入危机之中。这些人，尤其是社会中层人口，将会转向。一方面，他们反对那些似乎拥有一切并向他们开出一张空头支票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反对那些想要从他们辛苦劳动获得的成果中分一杯羹的人。如果蛋糕无法再做大，分配争斗会变得更激烈。人们惶惶不安，担心个人生存方式的基础无法再得到保障。

民主机构的陷落

这也关系到权力的转移。如国家议会等民主机构权力在丧失，而企业、中央银行和国际法庭则慢慢把持权力。例如英国的政治评论家凯南·马利克解释道，右派民粹主义力量之所以增强，是因为缺少组织优良的对手。原本工会等组织和其他社会运动的任务是向人们传递一种政治声音，反对没有限制的经济。但现在这种声音沉寂了。

这些经济和政治解释范例是无可置疑的。但都是管中窥豹。忽略了其中的错综复杂。聚焦于难民或是经济势态便会忽视其他：如刚冒头的文化斗争。难民和不平等问题是这场冲突的表现形式。它们只是一种症状，而并非原因。

怒视“上面的人”

这次的文化斗争仅凭数据和表格是无法说清的。这种斗争在感知层面上进行，是社会各种思潮之间的斗争。斗争涉及的是在部分民众中普遍存在一种觉得被忽视的愤怒。愤怒针对臆想出的建制阶层、“上面的人”，这些人对“普通人”毫不在意。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受到伤害，在文化上被抛弃。可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全球化和后现代

世界范围内人们受教育水平提高、福利和医疗条件改善、寿命延长。事实上确实有人明显受益于全球化。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与世界各地有工作上的或朋友间的联系，住在昂贵的市中心，维护着世界主义-通晓多语言的、自由主义的身份认同。他们通常会讨论一些英语概念，例如性别主流化或是素食日。

也有人认为，衣着光鲜的、热衷垃圾分类的精英阶层欺骗了他们。持这一观点的是在全球化中并未获益的人。对于他们，现代化并未发展出合法性。他们不愿被迫接受那些全球化主义者向他们兜售的所谓进步的东西，他们畏惧社会的改变。特朗普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承诺退出全球化，呼喊“美国优先”。

一个越来越现代的、自由的世界正在成长。它被不断重新构建。每一项发现都让它更为复杂，个人限制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孤独。在这样的世界，能够忍受矛盾心态是至关重要的。现代化的自由感催生出无力感，而这种无力感让人难以忍受，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变，社会规则在变。学者潘卡基·米什拉（Pankaj Mishra）称之为“解放的枷锁”。

很长一段时间，彻底的社会批判是现代社会的特色项目，因此如今恰恰也被反动的右派和威权人物利用。他们的要求是：威权而非自治。威权势力以简单明了的事实、攻击性的话语迷惑人心，具有攻击性地告诉民众：我们走的太远。他们给民众以机会将世界的复杂性简单总结为个人的伤害。怨恨让世界变得狭隘。男女平等？它摧毁了我们的传统！伊斯兰教？恐怖分子的宗教！欧洲一体化？受益的只有那些南德的懒鬼！现代的自由的世界变成了敌人。在这些简单的话语中，文化冲突找到了受大众欢迎的表述。

后事实

与后现代式的真相消失紧密相连的是特朗普得到广泛关注这一臭名昭著的现象。后事实或者简单的说就是谎言。在这一标题下诸如移民，难民、欧洲化、恐怖主义等现象纷繁交错。骤然间不再有事实，而只有阐释。威权的领袖人物如普京和特朗普将这点在政治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将事实置于他们的议程之下。哲学家菲利普·希伯尔（Philipp Hübl）将之总结为“意识形态优先，事实次之”。

聚焦身份认同政治

2017 发生了一系列极具争议的事件，如：种族认同，性别议题、性别少数群体或是社会多样性的反对与赞同。太多了吗？

普京和特朗普向他们的支持者承诺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相比于其他人，他们将这群支持者纳入自己的团体中。这样，自成一体、隔绝外界的人性需求得到了满足。

美国思想史研究专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强调，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左派本应为此开拓一片领域。里拉 2016 年 11 月在《纽约时报》刊登的名为“自由主义身份认同的终结”文章，该文在 2017 年受到热议。里拉认为，在社会及政治领域，自由主义左派的世界主义者太过关注身份认同政治，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斗争，例如有关物质公平的斗争。

加布里尔的看法与政治学家克劳斯·莱格维（Claus Leggewie）的观点相似。即：左派轻率地忽视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不再是阶级问题，而主要是身份认同问题。这一观点的知名反对者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他在 2016 年出版的书籍《返回兰斯》在 2017 成为畅销书。他坚持，人们不应将身份认同政治的斗争与社会和经济斗争对立。

右派阵营因为左派的不一致观点而摩拳擦掌：右派学者贝内迪克特·凯撒（Benedikt Kaiser）认为左派放弃了他们对社会公平与团结的叙述，这对右派来说是一次接手此叙述的历史性机会。这是一场结局未知的讨论。

新年新改变——做有态度的德国人

明镜在线 1 月 1 日专栏 2018 年，对于联邦德国（BRD）——德意志香蕉共和国（Bananenrepublik Deutschland，注：亦可简称为 BRD）来说是崭新的一年。把这个在世界上以整齐和清洁著称、各方面都运转得不错的国家称为“香蕉共和国”是否过于夸张？

如果您觉得这种说法言过其实，原因可能在于，您的要求也和整个国家一样降低了。知足常乐对个人而言不失为一种好的特质，但若整个社会怀着一种过于满足求稳的心态，结果可能会很糟。然而德国的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太多事情都已被德国人视作稀松平常。德国人太没有追求了。

让我们调转靶心，要在 2018 年为德国做好打算，因为为什么我们不断对自己提出各种要求，但对我们的国家却只抱有那么一点点期待？其中的原因在于，我们被深深根植于我们脑海中的、错误的德国形象所误导。

默克尔有一次在接受《图片报》记者采访时被问到，她在想到德国时会想到什么？默克尔答道，“我会想到严丝合缝的窗户。没有哪个国家能造出如此严密和美观的窗户。”

此番简洁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也算得上是默克尔任期内说过的为数不多的金句之一。谁都知道默克尔想表达德国社会运转良好这层意思，但德国社会真的运转良好吗？然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德国有以下五件事情并没有良好运转，在 2018 年必须得到改善：

- 国家在国民安全方面上草率了事。
- 国家未对数字未来早作打算。
- 国家为教育做得太少。
- 国家阻碍了德国人的自由流动。
- 国家容忍了国内的严重不公。

公民安全：保障公民人身安全是一国最重要的任务，那么德国到底有多安全？人们无法忘记极右翼团体“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NSU）的刺杀活动、新年前夜发生在科隆的性侵事件、卡车冲撞柏林圣诞市场事件，以及汉堡 G20 峰会期间的骚乱。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充斥着国家失灵的诸多案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失灵要么是因为政府工作混乱，要么是由于官方过度干涉所致。苦涩的现实是：行政管理水平低下或是国家过于收紧财政支出往往是使公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原因。

教育：学龄孩子的家长不用去看教育方面的负面数据就知道德国在这一领域投资不足：建筑、设施、人员——方方面面都缺乏资金。对于德国这么一个富裕国度而言，学校的现状还如此是很荒谬的。当然，这仅仅是针对公立学校而言。能承担起学费的家庭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私立学校读书，以确保下一代能够获取充足的教育资源。这体现了德国教育政策的非社会性。对此，德国必须每年在教育体系中多投入 300 亿欧元的资金，才仅能够达到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数字化：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只有自民党一个党将数字化议题置于其选战的核心地位，但众所周知，自民党又不愿意同联盟党和绿党共同执政。这在德国很典型。德国在目前在数字化方面还处于发展阶段，而政治又对此漠不关心。在光纤通讯即数据高速传输的扩建方面，德国落后了不止一点点——虽强于希腊和比利时，但远不及斯洛文尼亚、土耳其或者匈牙利。据德国工商业联合会（DIHK）估计，在未来十年，德国在全覆盖光纤通讯扩建方面的投资需求最多高达 1000 亿欧元。

交通：旷日持久的柏林新国际机场和斯图加特火车总站建设项目简直是荒唐可笑的德国交通政策的知名代表。现在还要再算上慕尼黑和柏林之间的德铁新线路。这条耗时 25 年进行规划，斥资百亿欧元的城际快车线依然无法保证列车准点。

但规划失误和能力不足仅仅只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缺乏一个以未来为导向的基础设施政策。一个自由社会所应具备的一项基本条件是——所有人都能自由流动，但德国已经从这一领域撤退。德国在桥梁、公路、轨道、运河的投资上陷于停滞。前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对自己能够平衡财政收支表示满意，但事实上，他这么做是寅吃卯粮。

不公：国家失灵最糟糕的表现就是社会不公平。“一些人甚至说我们的社会产生了裂痕”，联邦总理默克尔在她的新年讲话中说道。多么讽刺啊！不正是默克尔本人允许了德国社会的撕裂吗？

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及其同仁的一项研究，德国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又回到了 1913 年的水平。社会民主的世纪就这样逝去。富者依然富有，贫者却富不起来。德国每年约有 4000 亿欧元的遗产被继承，而相应的税收却只有区区 40 亿欧元，即仅占遗产继承金额的 1%。其原因在于，公司被很慷慨地排除在遗产税征收之外。有诸多此类数据，人尽皆知，却未见反抗。

德国如今的困境有两方面：管理不善和紧缩癖。我们国家的管理水平早已徒有虚名，而对于财政收支平衡的崇拜使得一些急需资金支持的领域的投资受阻。德国前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曾提出的“要敢于实施更多民主”！这永远不会有坏处。但在接下来的 2018 年，德国更应该遵循另一句话：“要敢于实施更多国家手段”。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18 年 1 月 10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朱苗苗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